

「讀書會」作為社群建立與行動之 女性主義方法：集體自傳民族誌*

于政民、¹ 李柏翰、^{2**} 林正揚、³ 張竹苓、² 廖士婷、¹ 劉曉彤、³
賴玫均、¹ 謝雨純、¹ 簡瑞琪^{3***}

¹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² 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

³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本研究採取女性主義立場論，以集體自傳民族誌的方法，闡述在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內部發起的性別讀書會，如何形構社群、進行微型抵抗並試圖重塑教研方法。集體自傳民族誌是帶有社會意涵的自我敘事過程，強調作者群共學共享之參與，適合用於匯集研究者／行動者的集體經驗，尋找相似與差異之處，進而與其深入地相處（deeply engaging）及討論，找出這些故事在敘事者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意義以建構行動計畫。原本是為撰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影子報告的任務性質暫時聚會，意料之外延續擴大並成為學院中的「支持團體」，

* 收稿日期：2023 年 11 月 4 日；接受日期：2024 年 5 月 9 日。

致謝詞：本讀書會曾受國立臺灣大學（臺大）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研究生學術研討小組補助支持。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23 年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及臺灣醫療人類學學會年會，感謝臺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官晨怡老師擔任評論人，給予許多寶貴意見。亦感謝臺大健康政策與社會研究學分學程的執行秘書葉明勸老師，對讀書會活動給予諸多協助。最後感謝讀書會的崇閔、琬瑜、佳欣，還有所有曾經參加過讀書會的師生，無論是否參與寫作，當下的討論與思辨都實質貢獻於本文發想和成形。

** 通訊作者。Email: pohanlee@ntu.edu.tw

*** 所有作者都有同等貢獻程度，包括資料蒐集、討論、分析與寫作。此處依姓氏筆劃排序。

透過密集討論與交叉觀察，我們發現性別在公衛教學研究的場域中明顯缺席，經常被質疑研究的重要性、教學中充滿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及忽視多元性別等方式被排拒在外。情感在這個強調客觀、理性、績效的場域中被壓抑，讀書會成員一邊觀察揣摩以學習關於性別的隱藏知識（tacit knowledge），一邊在鑲嵌各種性別成分的權力結構中游移於做／不做性別研究之間。作為學院內的少數人，讀書會成員透過各種細節線索尋找同伴、認出彼此、確認安全空間，進而建立得以談論性別的社群，透過經驗分享培養言說的能力並賦權，在個人生活中或以集體之力採取行動。

關鍵詞：集體自傳民族誌、女性主義立場論、知識生產、公共衛生、讀書會、支持團體

一、前言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內，一個性別讀書會中的個人與集體。讀書會緣起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前，本文作者之二受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及中華心理衛生協會邀請，撰寫一份影子報告，報告的資料來源之一即此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最初的内容聚焦於 COVID-19 與防疫措施對女人和女孩造成的影響，並蒐集學生們的觀察與反思（Jhang and Lee, 2023）。意外地，這個讀書會以閱讀、探討性別文本的方式延續至今，成員也不斷增加，依不同成員自身的位置性，文本選讀的深度及廣度逐漸開展。對許多成員而言，這個讀書會成為公衛學院中的支持團體。然而，為何在公衛學院會需要這樣的支持團體呢？

受到 2023 年台灣女性學學會（女學會）年會主題「知識典範、社群形構與運動發展」的啟發，我們以自身觀察，探討性別研究在爭取學術合法性之經驗與進程。讀書會成員在初步分享中提到在公衛學院這樣的場域「很難得到性別相關的研究資源」、覺得性別議題很「冷門」、做這議題很「孤單」，就算想做性別相關研究，卻可能因為這些擔心而轉換研究方向。這個現象或許與公共衛生的認識論有關。對於何謂公共衛生，較早期且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由 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 提出，公共衛生「是一門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及增進健康與效率的科學和藝術」（江東亮，2017；Winslow, 1920）。臺灣公共衛生源起可追溯日治時期為殖民統治與傳染病防治之熱帶醫學衛生政策和研究（梁璦尹，2005），故公共衛生常被視為客觀中立且應優先考慮科學及依法行政的專業。

經過近百年發展後，目前臺灣公衛知識與專業形象，已從早期著重數據導向，轉變為必須具備多元專業能力的綜合應用學科。這點可從相關系所必修科目、教科書內容與章節編排及公共衛生規範得知，包含美國公衛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ASPH], 2006）公告的五大核心能力，即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生物統計、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環境健康科學，以及在此之外的衛生法規及倫理。在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官方刊物《台灣公共衛生雜誌》中，可留意到刊載不同研究方法的論文且關心議題十分多元，但若從文章比例來看，亦可發現其對於科學的想像，大多仍建立在實驗與數據分析的量性資料之上來找出「事實」，也就是所謂以硬科學為主的研究方法（Storer, 1967; VanLandingham, 2014）。以過去五年原創文章為例，多數是使用量性研究為研究分析方法（83%）。使用質性方式，也就是刻板印象中傾向視為較易學習、毋須技術或適合女性的「軟科學文章」（Light, Benson-Greenwald, and Diekman, 2022; Storer, 1967），數量則遠不如使用硬科學方法的文章。

在性別議題方面，亦可從公共衛生認識論中看見扁平與邊緣化。在臺灣的公共衛生教科書中，女性最常在婦幼健康與家庭人口的章節和課程中提到，似乎說明在公衛中，女性健康只因其生育能力而重要，性／別少數群體的討論更是付之闕如。應該關照「公共」的公共衛生領域中，性別層次與女性視角明顯嚴重缺席，例如在《公共衛生學》這本臺灣公衛學界重要的教科書中，與性別相關的討論相當匱乏。又如與傳染病相關章節中，會將性別與年齡、種族、社經狀況等並列，視為可能影響疾病傳播與病程發展之宿主本身的特性或稱內在因子。在五個版次的這一章，皆未特別說明書中的性別是指生理性別（sex）或社會性別（gender），但從上下文脈絡來看應是指偏向生物

性的“sex”（金傳春，2009；金傳春、顧家綺，2015；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1989，1997，2003）。有關性別之社會意義，目前僅在修訂四版中關於社會流行病學章節中提到，比如在引述歧視對個人健康的影響，以及社會致病因素與健康不平等分析架構時，性別用詞的後方皆標註指“gender”（鄭雅文，2009，2015），而修訂四版中新增的「婦幼健康」章節，內容大多侷限於孕產與生育健康之範疇。

那麼，為何以性別（gender）切入來檢視公衛學術專業發展是重要的事？此處，性別作為一個視角，是指批判性地理解性別差異如何影響自我認同、人際關係與行為之社會性觀念，這些社會觀念對我們的身體創造並維持了特定的語言、符號與權力關係，亦形塑了相對應的「社會角色」。性別也影響著專業教育養成、研究議程與社會參與的機會。目前公衛知識的生產、傳播及實踐過程中，專業教育中普遍缺乏性別作為方法的訓練，學術成果難以應用於整體社會，亦難以實現公衛照顧全民健康的關懷（成令方、林宜平、劉盈君，2024）。研究若缺乏某種視野而無法提出合適的問題，便難以適切蒐集、判讀與分析資料。以事故預防研究為例，車禍測試通常以男性駕駛為標準，缺乏女性假人進行模擬，亦未針對意外事故數據進行性別分類，導致汽車製造商難以據此調整安全設備，使女性車禍受傷率更高，但卻經常簡化成「女人不會開車」的刻板印象（Carter, Flannagan, Reed, Cunningham, and Rupp, 2014）。

相較於一般公共衛生的教科書，全球衛生領域中常見的教科書，雖然對性別與健康有較多細緻的討論，卻同樣傾向將性別議題簡化成婦幼健康議題（如 Birn, Pillay, and Holtz, 2009; Marmot and Wilkinson, 2005; McCracken and Phillips, 2012; Parker and Sommer, 2010; Skolnik, 2008, 2012），不僅弱化婦女與兒少主體，亦容易直接將婦幼視為結

構性暴力之受害者而忽視她們的能動性（李柏翰，2018；Cornwall and Brock, 2005）。上述例子可以觀察出公共衛生（或其延伸之國際與全球衛生）作為教學及學術領域，對性別的想像是貧乏且單一的，大多只從女性的生理差異來解釋婦女和女孩的健康結果（health outcomes）與不同的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s），並且經常將“sex”與“gender”混為一談。此外，性別二分的前提及異性戀順性別之預設（hetero/cisnormative assumptions），不但常導致公衛數據蒐集將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混淆，也間接排除了非異性戀及非順性別者的資料。

以性少數健康為例，在將男同志視為道德敗壞行為的年代，公衛教科書在描述愛滋防治時會使用「經由不正當的性行為」、「特殊危險性的族群」與「規勸同性戀者收斂其性行為」等非實證科學用詞（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1989，1997，2003），也常用「同性戀」代指感染愛滋的男同志（金傳春，2009；金傳春、顧家綺，2015；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2003）。此寫法看似在描述歷史事件，但卻忽視當事人可能的多元性認同與實踐，並且未意識到女同志的存在，也突顯其他性少數（如雙性戀、跨性別、間性人等）在公衛領域中完全被忽視（于政民，2022），而公衛實踐也因此缺少性別視角。2023 年全球愛滋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為 53%，但女性感染者在全球愛滋研究中的可見度卻不成比例地低於男性。由於性別權力的不平等，女性及跨性別者在性行為中協商困難，難以採取安全措施而增加感染風險，這都是公衛不應忽略的性別脈絡（Gilbert and Selikow, 2012）。多元性別與性少數群體在全球衛生教育中的討論寥寥無幾，僅在性傳染病防治脈絡中「現身」，至於 2000 年以來關於少數群體壓力導致性／別少數群體身心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成果，則尚未列入相關教科書的討論之中（Lee, 2022, 2023）。

在公衛學院普遍缺乏性別意識的空間中，讀書會成員試圖透過自身所處的生活世界（life-worlds）與事件（events）反身思考並找出性別的意義、性別讀書會的定位，並探究為什麼在一個宣稱為了「公共」而存在的學術領域中，性別會被視為無關或不重要的議題？因此，這份集體自傳民族誌（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的書寫採取女性主義立場論，認為科學或宣稱科學的知識生產、演繹與學術訓練都是基於一種或多重特定強勢的認識論而來（Harding, 2006, 2008）。此觀點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些被圈定的世界與事件或許相互重疊，抑或單獨發生，成為敘事者／書寫者認知公共衛生場域的樣貌，作為一個接近特定現象的取徑，並得以彼此參照與詮釋（Cohen, Kassan, Wada, and Suehn, 2022）。

二、集體書寫：串連邊緣經驗作為抵抗與療癒的方法

本研究以集體自傳民族誌的方法，闡述在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內部發起的一個性別讀書會，如何形構社群、做微型政治抵抗，並且企圖建立能夠涵納多元性／別之知識生產的新典範。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是集體自傳民族誌研究方法的基礎，前者之目的在於發現並理解特定脈絡中的個人經歷，探索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在公共背景下建構某一主題之敘事，故此研究方法本質上重視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及反身主體性，並挑戰對研究客觀性或中立性的傳統理解（Ellis, Adams, and Bochner, 2011）。本文作者群受到 Lieselotte Viaene、Catarina Laranjeiro 及 Miye Nadya Tom（2023）之啟發，透過集體自傳民族誌，探究並書寫學術系統中的性別歧視、厭女與遮掩「有害校譽」性騷擾事件的傾向，並且將集體書寫視為針對問題

化現象（*problematized phenomenon*）「伺機」展演並記錄抵抗的方法（Bochner, 2017）。

與自傳民族誌略有不同的是，集體自傳民族誌受到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影響，強調多名研究者／作者共學、分享、協作，以及致力於共同建構知識生產的過程與結果等目標，交換體現（*embodying*）外在世界的內在經驗，形成「寫作共同體」（*writing community*）（Wężniewska, Szwabowski, Szczepaniak, and Pławski, 2019）。透過反覆對話，不僅交叉檢證（*triangulation*）彼此視角與對特定現象的詮釋，亦探討個人與集體經驗之間的共通性，以個別與共同回憶作為分析政治行動及其面對的制度和結構之質性資料來源（Tomaselli, Dyll-Myklebust, and van Grootheest, 2013）。如 Viaene 等人（2023）所提醒，記憶是活躍且動態、不斷變化的，其印象與敘事再現具有自我賦權（*self-empowering*）的潛力，而任何自傳民族誌的真相都不穩定，也可能過於第一人稱且充滿主觀詮釋，任何描述都不應視為絕對且單一的真相（*truth*），但這並不影響敘事者對現象理解之真實性（*reality*）。

多人共同書寫的自傳民族誌，同時包括多重且交疊的現實，但不應預設所有具有類似甚至相同經驗者的真實是平整一致的，其時間序列亦非線性的。集體中的每一分子在描述故事時，正因充滿情緒，必然垂直連結生命中各個節點發生的事，並水平地與他人情感串接，進而形成集體行動的認同基礎（Ahmed, 2021）。Tiffany Karalis Noel、Aiko Minematsu 及 Nikki Bosca（2023）細緻區分了關係自傳民族誌（*relational autoethnography*）、雙重民族誌（*duoethnography*）及集體自傳民族誌，雖然三者目標相近且皆強調民主參與、彼此同理及批判性反思等原則，關係自傳民族誌更強調協作見證（*collaborative*

witnessing) 與共享敘事 (shared storytelling) 來蒐集獨特經驗的片段及彼此間的連結，共構特定社會事件之集體解釋 (Ellis and Rawicki, 2013)；雙重民族誌亦常用在並置多個經歷相同現象之不同主體的敘事，但避免特定形式之方法亦擁抱歧義，以追求在敘事中形成互為主體以實踐關懷倫理之可能及彈性 (Valdez et al., 2022)。

與上述兩者不同的是，集體自傳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從頭到尾皆仰賴集體工作，而不只是蒐集個別參與者之反思性寫作，強調每一個步驟皆參與共作（包括從一開始選擇讀本、協作讀書筆記，到後來的寫作與編修）。本文與 Karalis Noel 等人 (2023) 採用方法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著手這項研究及寫作的動機並非出於特定理由，而是在讀書會討論中自然有機地開始且發生，我們也沒有使用小組內部相互訪談之特定方式蒐集資料，而更類似 Heewon Chang、Faith Wambura Ngunjiri 及 Kathy-Ann C. Hernandez (2013) 提出的方法（針對讀書會形式略有差異，但不影響整體研究過程），包括以下步驟：

- （一）研究問題誘發 (critical reflection on recurring themes)：針對讀書會不同主題討論中反覆出現的「議題」，開始集體反思為何有此現象，並很快地就把「權力關係」納入初步的討論中。
 - （二）問題化 (problematization)：回頭檢視讀書會共筆，並在讀書會中特別撥出時間討論上述「議題」是否為一普遍經驗的現象。
 - （三）初步資料蒐集 (preliminary data collection)：由於每個人加入讀書會的時間點不同，初步以讀書會共筆作為回憶／敘事基礎，另開啟共編文件進行個人的反思寫作，並且即時回應彼此寫作，是一不斷開啟新對話框的動態過程。
 - （四）共享詮釋及分析 (shared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一起讀所
- 有人的反思寫作及「共時發生」的對話，討論並確認對特定現

象之詮釋；此時亦納入每個人所屬位置之差異，以探究「共同觀察」中之落差與可能原因。

（五）進階資料蒐集（subsequent data collection）：針對上述初步分析結果，進行第二輪寫作與回應，此時著重不同「主題」意義建構（meaning-making）的過程，並加入不同主題所誘發之情感與情緒反應及其批判性反思。

（六）集體協作／寫作（collective/collaborative writing）：最後的寫作與第二階段所蒐集到的敘事及對話資料雖然幾乎同時發生，從共享詮釋中確認文章架構與寫作分工，但寫作過程實際上是在另外開啟的共編文件中進行，以免混淆並確認集體詮釋的結果。

集體自傳民族誌被視為是具有社會意涵的自傳民族誌，適合用於研究行動，意即將研究者／行動者的故事匯集起來，去尋找相似與相異之處，進而與這些經驗現象深入地相處（deeply engaging），以找出這些故事在敘事者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意義，以建構行動。因此，在我們分別書寫與共同討論民族誌紀錄時，著重觀察三件事：（一）我們的個人經歷與記憶；（二）與我們共享相似經驗之人的個人經歷；（三）我們對機構及場域中行動者之集體觀察。必須強調的是，我們在民族誌中所著重的並非公共衛生領域中特定個人的責任歸屬，而是透過單一或重覆發生之事件來探討制度與機構責任，並揭示知識生產與教研場域中可見和不可見的權力關係。

在最後的探索共享詮釋階段，我們採用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作為分析民族誌文本的基礎。女性主義立場論主張受壓迫群體為理解社會結構和權力動態提供了獨特的觀點（Crasnow, 2009），這一理論認為，從被壓迫個體的立場產生的知識，比從主流觀點知識更能準確地理解現實（Rouse, 2009），受壓迫

群體的個體因為擁有獨特的立場，這個立場源於本身在歧視和不平等方面的生活經驗，賦予他們從批判性視角來揭示主流敘事通常忽視的隱藏的權力動態、偏見和制度性不公正。女性主義立場論尤其挑戰了客觀性的觀念，主張沒有任何知識是真正中立的；相反地，知識受到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的影響（Collins, 2009）。由於受壓迫群體處於權力邊緣，他們的洞察力對於揭示社會結構的複雜性至關重要。

本文作者群參與讀書會的時間不一，在集體書寫的過程中，採取個人任選英文字母作為代號，以平衡作者顯名與敘事者匿名的倫理考量。在討論彼此的民族誌文本時，每個人都不斷在辨證匿名（anonymity）與安全之間的關係，這層考量幽微地顯示出制度意義下的「學院」有一股隱藏的權力關係默默運作著，影響了不同位置中的我們各自的考量與擔心（Rutter, Hasan, Pilson, and Yeo, 2023），包括：希望順利升等的專任助理教授、非典型勞雇型態的專案助理教授、專任研究助理，以及博士生、已畢業及在學的碩士生。由此出發，參與寫作之讀書會成員各自的位置性（positionalities）簡述如下（見表一）：

表一：參與讀書會的作者群簡述

代號	簡述
A	剛進入臺大公衛的博班生，從大學起便持續關注研究性別與醫療議題，並有相關倡議、教學與參與組織之經驗。
AwA	臺大公衛學院碩士生，大學主修學門是生農領域，雖然大學養成訓練過程都試圖將其變成理工腦，但是心裡還是有一個喜歡社會人文的靈魂（共同寫作時仍在學，文稿完成時已畢業）。

C	臺大公衛學院碩士生，從事過醫護工作，以較不衝撞的方式參與勞權的社會倡議，直到念碩班才特別關注到性別議題（共同寫作時仍在學，文稿完成時已畢業）。
D	臺大公衛學院博士生，雙性戀生理女性，曾長期待在「如同真實世界顛倒過來般」的性別友善、在各面向上都相對平權之地。雖未鎖定性別為「正式的」研究領域，卻始終相信無處不性別，所以對性別這件事也應無處不思考、無處不研究、無處不實踐。
J	從小到大歷經好幾次認同危機（性別氣質、性傾向、國族、身體狀態、專業領域），現在滯留順性別熊族男同志這個身分。常覺得自己誤打誤撞去到錯的地方，入行學術工作三年多仍有強烈冒牌者症候群，隨時想逃走。有很多不為公衛人所接受的「壞習慣」，總是遮遮掩掩。
Q	在人文社會學科和社會運動長大，不知怎麼進到臺大公衛教書，看來很突兀又感到無比合適。雖然總是焦慮，但很幸運地有很厚的同溫層。做什麼都繞回性別，人生原則是要無愧於心（文稿完成時已離職）。
U	臺大公衛學院碩士生，順性別女性，大學時期主修學科為社會人文領域。曾經對於性別的討論感到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而常常選擇逃避，但經過碩班期間的許多體悟，決定重新面對自己內心最深切的關注，開啟性別之眼（共同寫作時仍在學，文稿完成時已畢業）。
ww	臺大公衛碩士生，偏愛質性研究。大學主修心理學時開始關注性別議題。非臺灣人、非異性戀、順性別女性，自稱是女性主義者。因身分政治在多數身分上有認同焦慮，願望是透過反思與實踐創造無須自證身分的生活（共同寫作時仍在學，文稿完成時已畢業）。
Y	公衛學院研究助理，曾在馬武督赤柯山下讀小學，常常會把自己不具性別意識的行為、與他人不具性別意識的侵犯話語而感到不適，爸媽覺得這個兒子地雷很多。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或多或少的自我揭露、曖昧不明的現身，是我們有意識在敘事與

倫理上的共識，作為女性主義方法自傳民族誌為「個人即政治」之主動展演 (Ettorre, 2016)，其中的困惑、困擾、自我矛盾等情緒反應被制度框限出的情感結構 (Chatterjee and Lee, 2023)，正好是我們試圖問題化的現象。在作者必然顯名的情況下，我們在意可識別性的政治意義，與之相對的在行政關係中自保的隱密性，「連要不要匿名的糾結，都成為需要辯論的主題」(Q)。在相關討論中，我們也發現除了職級與性別外，過去的專業及倡議背景似乎使某些成員對保密與發聲自由之間的張力特別敏感，「討厭自己害怕，因為隱匿掉與結構位置相關的資訊有些可惜，但……」(D)。

就如 Jane Edwards (2021) 在反思自傳民族誌寫作時的研究倫理與匿名性及私密性之可能與不可能，我們亦不禁反問「體制真如此可怕嗎？」、「(我們)真的可能不被辨識嗎？」這些在開始分析自敘文本前湧上的痛苦與「一股說不上的悶」(J、ww)，令讀書會成員在女性主義方法論上主張情緒作為倫理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憤怒的情緒來自於發現自身的倫理界線被觸碰與挑釁（在曾有社會運動經驗及人文社科背景的成員中尤為明顯），一切的猶豫不決反而突顯出集體寫作與集體記錄之必要，透過邊緣經驗之串連，作為抵抗與相互療癒的方法 (Karalis Noel et al., 2023)。因此書寫策略上，我們將共享經驗混合著寫在一起，成為短段落引文，長段落引文則為經驗性分析時所使用的具體案例或思考過程之再現。

三、集體自傳民族誌「之中」與「之外」：形成社群

本文透過作者群集體自傳民族誌的書寫，辨認出身處的學術領域之樣貌、慣習、文化等，並加以檢視和批判。在分別書寫後，所有成

員閱讀彼此的文本並給予即時、不修飾的回應，爾後一同討論浮現而出的主題編碼（thematic codes）。這裡包括從初步資料蒐集後，透過密集的文字對話框與線上線下討論中，尋找對於某些「學院內」共享經驗之詮釋，至於「學院外」之個人觀察與經驗則在交流中找出類似或不盡相同的經驗與感受（如各自在家中、求學、求職過程中的性別經驗）。我們藉由這樣的過程，在眾多敘事資料中，逐漸定錨共同在意的問題／主題——讀書會作為一種介入，讓「我們」因此看見、發現、確認或改變了什麼？我們最後界定出五大主題，這五個主題並不完全呈現線性的過程，但實際上互相關聯，包括：（一）邊界、規則與物質性及象徵性的「門擋」；（二）應用科學中被捍衛的理性與被排斥的情感；（三）面對公衛中的權力結構：妥協或陽奉陰違；（四）試探邊界：安全空間、社群與言說的能力；（五）讀書會之於個人與集體：勇氣與付諸行動。

本文呈現的研究發現，以作者群相似的經驗為核心，討論這些相似經驗所指涉且照映的結構性現象。在各自與共享的經驗中，我們逐漸認同讀書會成為一個社群，這個社群的邊界雖然是不穩固且開放的（因為持續廣納並歡迎新的成員，讀書會中討論與批判的主題亦不以性別議題為限），但目標及成員共享的團結感（solidarity）卻是逐漸穩固且堅定的，例如，我們大多能認知到「事情……『就、在、我、們、之、中』發生」（D）：

社群的互助卻往往能夠更彈性、更有效即時地接住受到傷害的成員。但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前提，很重要的是對等，如果我們明知權力的不對等會造成（而且已經造成）這樣的後果，而沒有提出改善的機制，那是我們作為我們的失職。（D）

集體自傳民族誌所反映出的現實「之中」有成員之間的情感與經驗連結，而對該現實之肯認更凝聚成一股讀書會「之外」面對、周旋、協商或抵抗公衛學院與公衛知識生產中的「異性戀順性別常規性」(hetero-cis-normativity)，以及對個人造成之潛在和具體的傷害（亦參見 Pillay, Ntsetmen, and Nel, 2022）。這個社群內部也需要時時提醒、反思，甚至警惕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畢竟師與生之間、專任與專案教師之間、專任與兼任助理之間、勞雇型和學習型助理之間、博碩士生之間，都存在高等教育制度所賦予的相對位置及階序，而確保「我們」是在女性主義原則上維繫社群關係，需要所有人都對權力時時保持敏感的。

平等的關係應該是雙向的，對老師來說，可能需要避免權力的濫用；對學生來說，要避免對權威的迷信。讓人很意外的是，在不知不覺中，我們似乎做到了？或許這就是女性主義的魅力所在，它幫助我們警惕這些事。也是在這個讀書會中，我們以「女性主義無懼打破權力關係」的默契形塑著現在的社群……。(ww)

從自我敘事的文本中，我們都能看見一個從自我懷疑（想言說卻被迫噤聲）到獲得社群支持的軌跡，每個人都在「成為公共衛生人」的過程中「學會、摸索在這個空間裡面有什麼不可以說，我們花時間去辨識象徵『安全』與『友善』的符碼」(J)。這個探索的過程不只需要先壓抑自己的「叛逆」，也需要暫且擱置或否定難以言喻的情緒——「學術訓練就是這樣嗎？情緒一直被私人化，即便它其實是很公共的東西」(ww)。一名未參與書寫民族誌的讀書會成員，某次參加我們寫作討論時也分享到，我們似乎「在學術訓練中學習把自己抹

除」，所以「一直避免在論文裡提到自己」。反身於己，女性主義提醒我們將自己置回脈絡中，與他人的經驗產生串連，不恣意宣稱普遍的宏大敘事，但也不否認被壓迫者的社會真實。

（一）邊界、規則與物質性及象徵性的「門擋」

作者群提到，雖然在剛進入公衛學院時，有些人因為與理念接近之人相處的愉快經驗，而認為和其他的社會場域相比，還算是個性別友善開放的環境。然而，在進一步與學院中其他老師、學生相處之後，卻漸漸察覺在這個環境中，並非所有人都重視與支持性別相關的討論和研究，甚至有同儕與同事抱持著較為保守甚至錯誤的性別觀念，並對性別相關的議題與研究表現出較為尖銳與負面的質疑（A、D、J、Q、U、Y、ww）。這是最初對公衛領域的邊界與規則的認知。

目前公共衛生量性研究中，多數仍以生理性別的男女作為分類去跑統計，性別種類不夠多元。雖然，有時受限於資料庫的原始資料，並無多元性別資料可以使用，但這不代表在最後研究結果的分析和詮釋上，可以忽略性別的考量。（C）

這個領域對性別研究理念的輕視，除了直接否定的態度外，更多時候體現在認為性別議題毋需討論的情境中，如在課堂中老師或同學對性別議題的不當詮釋，儘管作者群試圖向他人解釋其中的問題，但許多時候得到的是對方的不解並對提問提出質疑（A、D、U、ww）。擁有社運及倡議背景的成員因過去經驗之滋養，對身邊正在發生的性別事件較為敏銳甚而敏感，經常將相關觀察帶回讀書會討

論，討論過程亦帶動其他成員「看見」特定事件中的性別意涵，並藉此反思過去「未曾以性別角度來理解的事件」（AwA）。透過不友善的互動，我們感受到公共衛生學界「不把性別當一回事」的慣習，而想要挑戰這個慣習的人也容易被推到邊界。

意識到這個現象後，認為性別議題很重要的作者群，開始權衡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與其中的人們互動相處的方式，以符合該場域的期待與規矩。例如，觀察他人的衣著打扮、聽聞前輩的師生關係建議、不強力回應師長或同學的不當發言等（A、D、J、Q、Y）。這種被動的態度也呈現在特定行動者內心的自我糾結上，「我現在『貌似』也在體制內（或是『足以代表』某個體制），所以我似乎略顯綁手綁腳。在這個過程中，發言的能動性好像被抑制」（J）。

即使感受到公共衛生學院的邊界，部分讀書會成員仍舊會有想做的事情，比如仍想做自己、表達自身想法、覺得性別議題需要關注、想做性別相關的題目。然而，在把想法表達出來或行動時，就會遇到所謂如「門擋」的符碼，感受到「原來我這樣做不行」、「有人不希望我這麼做」、「我這樣做會受到他人的質疑」、「覺得自己的研究主題很冷門或不被公衛界重視」（U）。例如，有成員在自己的空間擺放彩虹旗遭到資深教師關切，有成員在做性別相關題目時會特別被挑戰重要性在哪裡，有成員想在校內找尋性別相關和討論議題的空間，卻只有臺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學分學程」，其他課程找不太到。

曾經發生過具體例子包括，A 遇到資深教授不能理解為何要強調生理性別跟性別認同的差別，覺得世界上就是簡單的男女二分，「不應該這麼複雜」。U 在某堂課上老師講授了一整節有關女性健康平等內容後，卻有同學反映「為什麼不關心男性？」；有教授預設所有學生都是異性戀，忽略非異性戀者存在的可能性後，又質問「同志還

是弱勢嗎？」；身邊同學在看完整個愛滋相關展覽後，仍覺得愛滋污名可約束「行為不檢點」的同志，因此有存在（用以規訓男同志）的必要性（D、A、U、ww、Y）。又如「某教授在課堂上向同學們簡介某經濟學雜誌的內容，提到跨性別醫療」：

老師評論，雖然現在性別相關的概念在世界跟臺灣都有很多討論，但要在小學階段就教他們性別認同這樣的觀念，是不是會讓他們更混淆呢？像美國有些州現在就沒有讓小學生學這些，那麼臺灣是不是也要參考跟進？……該篇文章主要在討論未成年人的跨性別荷爾蒙療法，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其療效似乎不如以往宣稱的好，且證據等級薄弱，並可能導致同性戀被錯誤地認定是跨性別，進而在荷爾蒙的影響下產生無法逆轉的生理改變。（A）

這名老師僅談及文章開頭背景介紹的一部分，加上自身看法形成感想，片段地向全班同學講授的內容不僅有所偏頗，更忽視當前跨性別研究的發展：跨性別者多在青春前期便已察覺自身性別認同與大眾預期的有所差異（James et al., 2016）。延後教導學童認識多元性別相關概念與議題，不僅不會改變或改善其性別認同，更會導致身心健康與發展的不利。¹公衛學院教學現場「不僅沒有與時俱進更新知識，更在課堂上公然講授錯誤訊息，實在需要當場糾正以正視聽，但礙於

1 該篇文章的觀點其實也充滿爭議與瑕疵，像是將性別與性傾向視為二元對立的概念，未將非二元性別認同、雙性戀、泛性戀、無性戀等納入考量，並把同性戀當作反對跨性別的代罪羔羊，將正確但脈絡不同的資訊交錯，拼湊成看似實在，實則充斥錯誤與矛盾的證據，以支持文章作者反對青少年使用跨性別荷爾蒙療法的立場等。

師生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我沒有即時反應……」（A）。這些「門擋」的形式，有時是旁人提醒告知不恰當、有時感受到他人的不理解或不願理解；有時是想取得資訊、想討論卻被忽略或延宕。

「門擋」作為一種體系下的保護機制，也同時是種消極存在的界線。門擋的存在，影響部分成員在行為和意識上的表達。例如，在做事時瞻前顧後、隱藏自身性少數的身分認同，或者即使不認同對話內容也只能簡單帶過、換話題或沉默。所謂規則和邊界即是個人在身處的場域中感受或體驗到的「門擋」，限制了性別與敘事主體的能動性，這不僅限於「公共衛生教育」的物理環境而設置，亦關乎性別角色期待、權力關係、傳統長幼規訓等，在在都影響到成員表達與行動的能力。

（二）應用科學中被捍衛的理性與被排斥的情感

延續公衛領域的規則、邊界，以及兼具物質及象徵意義的「門擋」討論，讀書會成員發現到公衛領域講求理性、精確、效率、簡化、績效、正確、「應該像個大人」（J），似乎難以容納情緒，這些情緒包含因為身為少數的不舒服、掙扎、懷疑、不自在、複雜、流動與可能犯錯，亦即理性是好的、情緒是不好的，而「情緒跟理性跟性別是很有關係的，會有一種男性是公領域的、理性的，女性就是私領域的、情緒的」（D）。在讀書會中，成員雖依個人感興趣的主題進行討論，但不約而同經常觸及「情緒」面向，例如情緒勞動的性別化分工（疫情居家隔離下女性的情緒勞動、健康行為的協商過程、護理工作情緒展演）、社會對特定情感之排斥影響了健康行為與健康結果（女性病人因身體和情緒的雙重疲乏而延遲對病況惡化的認知、疾

病受苦的狀態等）。公衛以效益主義為預設的倫理邏輯（葉明勸、李柏翰，2023），似乎較少討論情緒面向，或者說在決策時將人更多地視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當然理性和情緒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但在情緒難以被安放時，成員同時感受到公衛領域的規則和疆界。

通過成員輪流報告與討論，在一次次的言說中，互相對照、肯認那些隱微的性別經驗、觀察，以及延伸的複雜情緒，強化了彼此間的連結，而逐漸形成一種集體性。在面對公衛領域的理性、對性別不夠理解和友善的規範乃至壓迫時，有些成員的第一反應是不舒服、不自在，甚至很快地延伸出愧疚、自責、心虛、緊張、覺得自己太敏感等自我懷疑的聲音（D、Q、U）。因而說話、行為、決定都變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造成學院其他人的負擔，即使其他人的確對自己非常不友善。然而，在出現這些情緒後，自我檢討跟矛盾，反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勇敢說出自己的意見，或是對不能言說感到無力，不知道如何在效益主義至上的公衛領域中，說服他人甚至自己，性別議題或對性少數的關注是重要的（ww、U、A、AwA）。這些不安也往往反射在研究題目上，好幾位成員都曾經問過自己「這個題目夠公衛嗎？」，例如：

沒真正受過公衛專業訓練的我，有什麼資格去說這一定是或不是一個「公衛問題」，但我覺得撐出一個空間讓學生自由地去想像「什麼是健康」是很重要的事。作為一個應用性學科，公衛自己也常常有領域認同跟正當性危機，不就正好需要包山包海去思考生命與生活的問題嗎？想著、說著好像很有底氣，但其實我內心充滿不確定，「我不懂疾病不等於我不懂健康吧？」但這是公共衛生的意思嗎？什麼是公共衛生呢？（J）

就如同其他領域，公共衛生應用科學必然有固有的領域邊界和分類，例如流行病學、食品安全、環境衛生、行為科學、職業衛生等，自己關心的議題如果放不進這些分類中，就會引發焦慮和不安（J、Q、AwA）。再加上公共衛生學科似乎更強調效率、績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分配資源以求關照大多數人的需求。J 在某一次針對自傳文本內容的討論會中進一步提到：

若我們接受社會團結與連帶性（solidarity）是公衛基本倫理基礎的話，任何人不健康都會影響到其他人，而「漠視」造成的傷害與成本效益無關，因為沒有任何效益，只有大傷害跟小傷害的區別。（J）

這個「理性至上」的傾向或許也能用以解釋學院裡常見的師生關係：碩士生追隨老師的研究計畫設想並撰寫論文，這樣「最保險、最公衛，也最有效率」，但各方面可能很容易就剝奪了學生主動發想研究問題、蒐集、整理和解釋資料的自主性與空間，這樣的關係傾向家父長的權力模式，雖不是公衛獨有的問題，但在公衛領域中的確是一種常規（Q、Y、J）。有些成員在研究題目的選擇上，採取了比較「不公衛」的路線，即使要花更多力氣說服自己與他人主題的重要性，卻在過程中更加確認自己的能力與貢獻，也在看見性別視角後，重新看待自己的出發點，並確認自己在公衛領域中為何能做性別相關主題（C、A、U）。

讀書會是一個允許我們不正確的環境。批判很重要，多方資訊交叉驗證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擁有一個允許我們開放

討論、「即便錯了仍然有機會重新思索」的環境？如果有的話，那麼這個環境對成員來說，是值得留下來的……讀書會很可貴的點是，比起單純審判何為對錯，理解問題脈絡更重要。(ww)

簡而言之，這個讀書會提供了空間讓成員可以辨識所在之地、所處位置背後的結構、特徵與侷限，也是一個可以擺放並坦然分享各種情緒的地方。這個揉雜理性和情緒的空間，在成員的彼此賦權（empowerment）之下，讓女性主義式的關懷倫理（feminist ethics of care）在公衛及其他應用科學領域強調生產力之企業邏輯（corporate logic of productivity）下成為可能（Yoder, 2018），讓所有人在一起讀書的「當下」也能同時處理情緒、直面恐懼，並轉化成集體重塑公衛邊界的能量（J、C），讓「性別不再只是一個主題」（Q），也是相互連結、提出批判的共享視野，能夠問題化對健康議題既有的認識論與理所當然的詮釋方式。

（三）面對公衛中的權力結構：妥協或陽奉陰違

在公衛學院的那棟建築物中，讀書會成員作為少數者之存在，「時常感受不到這個結構是為我們而設……覺得在這棟樓所存在的體制並非學術性別友善的」（ww）。不過，我們當然「不是到了學院才開始學『做性別』」（Q）。性別是鑲嵌在日常生活腳本結構裡的重要成分，包括讀書和工作的空間，而這裡的「做性別」是指個人習得並身體力行特定性別的社會角色、互動知能與技巧（游美惠，2009；West and Zimmerman, 2009）。有讀書會成員在重男輕女的家族與社會氛圍中成長，從小到大總需要「證明男生能做的，我也可以」，卻覺察這樣子其實無法跳出厭女的社會框架。

女性主義者之所以成為女性主義者，不是因為不厭女，而是因為他們可以誠實面對自己身上的厭女，從而做出不一樣的選擇。於是我一邊為自己過去像周圍男生一樣克制情緒，執迷於競爭的樣子感到十分羞愧，一邊又憧憬著女性主義可以為人生帶來真正的幸福……女性主義不承諾任何虛無的幸福，只引導人不斷地去質疑，那給我帶來的多數是無窮無盡的痛苦和反思。(ww)

實際上，性別差異被賦與的意義遠超過身體本身，還包括話語和情緒上對個人自主的宰制，但「過往受到的教育只教導我恐懼，卻沒有教導我如何面對恐懼」(C、D、ww)。此外，基於安放好的性別與師生位置，恣意逾越身體界線，「拍肩『鼓勵』而不考慮他人感受」的狀況也所在多有(D、ww)。試圖將男孩、女孩安放在二元、各自的位置上，例如以前「從來沒有因為身為女生這件事吃過虧」，直到某次「爸爸開車載我到車站時，看到我穿破褲時輕拍我說『要多穿裙子啦！』為什麼管我的穿著？又為何是裙子而不是『不破的褲子』？因為不夠女性化嗎？」(AwA)。學「做性別」的壓力不分男女，也有成員從小就意識到自己被期待像個男孩，儘管他「一直對這個身分略顯疏離」：

從小相對害羞的個性，讓我即使身為異男，也在小學五六年級就意識到，身而為人，很多行為都需要依社會期待「做性別」，例如被媽媽要求：喝水就喝水不要翹小拇指，言行舉止經常被揶揄你這樣很像女生等等，且父母師長往往無法解釋為什麼能或不能這樣做，再追問下去大人就要惱羞成怒了……。 (Y)

比如張晉芬（2022）對醫護人員工作場域之觀察，工作中往往隱含性別的隱藏知識（tacit knowledge），既不制度化，也未被明說，仰賴大量的口耳相傳、體現、對脈絡及對各種情境的掌握程度，並做出詮釋和判斷。讀書會成員都發現，彼此在不同實作上學習著各種關於性別的隱藏知識，比如揣摩年輕女老師可不可以「不做溫良恭儉讓的表演，總是無償提供情緒勞動」（Q），抑或透過觀察他人素色、有領的服裝「模仿展演出男老師的樣子」（J）。性別之間的分際也與異性戀中心主義（heterosexism）有關，例如在各種溫馨提醒、新師或新生訓練、緊急聯絡人填寫、研究會議和餐敘中，被預設為異性戀順性別者而需承受的誤解、不合時宜的建議、錯誤的知識，甚至帶有戲謔偏見的耳語（Q、D、Y、U、A、J）。

然而，無意識的性／別預設，卻造成公衛知識生產過程如何「拒做」或「不做」性別研究。在這裡我們藉由 Susie Scott（2022）區別經驗上具有意識的拒做（undoing）與不經意的未做（non-doing），來討論性別研究在公衛領域中之邊緣化，以及「常常需要說服他人」的勞動與反抗策略。大部分的人都曾遇過「這個議題有什麼好做的」的質疑，或自我事先審查研究主題。那是一種由公衛學院裡眾人默許的「長幼有序」、「尊師重道」父權溝通模式進而內化的產物，因此當資深老師隨口批評女性健康與性／別少數群體健康時，可以不被檢討（A、C、J、U）；在有意識反對／拒做性別研究的教授暗示他人也應該如此時，性少數研究者就需要隱身，或者遇到難以好好討論時，即便生氣也只能「打哈哈帶過」（C）。

認為性別無關痛癢的整體氛圍也間接抑制了學生對女性主義的好奇心（feminist curiosity）（Zurn, 2021），使得學生下意識「不做性別研究」、做得心虛，或刻意降低兼做倡議、「不務正業」的成分

(ww、D、A、AwA、U、C、J、Q)。成員在參與讀書會討論及書寫本文過程中，回溯起自身在不同社會生活場域中的身分，識別自身作為少數或多數的存在，漸漸感知到公衛中權力結構階序的模樣。相對於公衛其他場域，讀書會的女性及同志成員較多，加上更關注性別議題，使讀書會在某程度成為「烏托邦」而存在。成員在讀書會中不再感到自己是「少數」，同時也不斷思考為何這樣的場域難以吸引順性別異男的參與，映射出像公衛領域如此應用科學的世界裡，「我們」才是少數(Q、D、ww、C、U、J)。

公衛的權力結構往往只呈現人們的單一身分(師／生)，這是這個結構得以運作的方式，但實際的運作遵循更複雜的邏輯，若能看見個人身分及其對應權力的交織性，便是一種「對權力的顛覆方式」(ww)。除了性別與職級(資深／資淺、終身／待定／約聘等教職身分、年齡)，我們也發現階級、身心障礙與族群身分在公衛學院中的人際交往及知識傳授中默默發揮作用。²交織性討論的是多重弱勢的加乘效果，但在結構的另一個端點，多重優勢導致的加乘效果等著被

-
- 2 感謝審查人特別提問其他交織因素之可能性。在我們的日常觀察及讀書會討論中，確實還觀察到階級、身心障礙與族群身分扮演的角色，惟作者群於寫作時主要探究性／別與職級之交織。階級反映的是個人社會與文化資本之差異，儘管位於國立大學之中，但需要打工與否、有無「閒情逸致」參與各類文化活動與講座、手邊是否有許多研究計畫、請不請得起助理，成為個別成員在學院裡能見度與影響力的因素。又如大部分高等教育場域，講求生產力、效率及相應之僵固的時空資源分配強化了健全主義(ableism)，使多元身心狀態的師生(如神經多元、讀寫障礙或肢體損傷等)只得「苦撐」或被迫放棄(Chatterjee, 2023; Kwon, 2024)。又作者群中沒有原住民族成員，因此未包括在我們的反身書寫中，但有不少成員參與原住民族健康研究，讀書會共筆中亦記錄到相關議題「邊緣化」狀況之觀察，也留意到過往研究隱含了針對原住民族之種族及行為偏見，知識生產的過程也鮮少以原住民個人及社群主體為出發點。

指認並打破。在公衛學院裡，用以區分並鞏固權力結構的細節數不勝數，例如「助理教授的門牌都是用紙貼上去的，副教授及教授才是製作一個真正的門牌掛著」（D）。某些男性老師濫用權力霸凌職員，卻不容被提出；老師曾性騷擾多名學生卻仍被留職的事情彷彿不能碰觸（D、C、Q、Y、J）。

我們藉由女性主義與讀書會對話中的反思以及實踐經驗，嘗試找到權力結構的破口，有直球對決也有陽奉陰違，不同應對方式取決於抗爭對象是否具體、環境中是否允許拆解的氛圍，並算計對抗的成本。「少數」是一種處境，令我們因為個人身分的交織性，而感受到自己在不同場域權力的有無或增減，比如「這個讀書會讓我更深刻感受到，我受到的教育、生活的環境，都是被選擇過的」（C）。若能看見自己在結構中的位置，便有可能消解原有結構、創造新環境，比如J曾被資深教師勸導「應該是你帶學生去做你的研究計畫」，但有別於這類家父長主義模式，他更願意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重新探索新的興趣。ww亦從自身的親密關係中意識到：

權力就是，我覺得我可以這樣做，只要我想，輕而易舉；反思權力則是反問自己，憑什麼覺得自己可以這樣做？如果我可以，必須如此嗎？（ww）

我們消解結構性不平等的能力及動力，受限於龐大權力結構的運作機制。反思自身時，社會對名校師生的期待觸動成員不斷自我檢討的「冒牌者情結」（Q、J、ww）。不假思索的自我懷疑成為延續特定知識文化的產物與手段。一邊惶恐一邊掩飾不安，成員開始籌劃起如何「變強」：內化「時間就是金錢，升等就靠發表」的邏輯（J）；每

當對一個主題有興趣想發展成研究時，被迫直面「這有賣點嗎？」的疑慮（D）。這個過程（「只好擱置或延宕性別」）與女性主義的行動方向相悖，造成「變強這想法某種程度上也荼毒了我自己」（C）的困境，讀書會成員因此常陷入兩難：

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我，有好好「用好」那份利益嗎？我常說，自己是騙進臺大的……我曾為冒牌者症候群苦惱過，但我不喜歡最開始的「不配得感」，因為不論我覺得配不配，我已經得到了。……然而，這個名牌給我的光環，我用好了嗎？就承認好了，我的確是踩在了別人肩上，才有辦法看更遠的世界，那在看過之後，我為那些把我扛起來的人做了什麼。（ww）

讀書會因此就像個卡在黑盒子開口的地下組織，一群處處見縫插針的人們形成「反公共」（counterpublic）——利用學校的資源與空間大聊其他人不感興趣或不覺得是公衛守備範圍的議題（Fraser, 1990; Loehwing and Motter, 2009）。看似針對日常生活現象的討論，卻是重要的理論化資源，也檢驗著西方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在臺灣的適用與不適用性（J）。在兼具時間與空間意義的「當下」，每個人都有機會誠實分享自身的困惑，「想為其他人合理化，又質問自己為何要幫其他人合理化」（Q、ww、U、C、J）。此外，我們也同時體會到權力的效力，比如討論近年系所內的 #MeToo 事件時還是「下意識鎖上門了」，防止被讀書會以外的人聽到（Y）。

本文就是在書寫這種飄搖的狀態，探討我們個人與結構之間不斷拉扯的關係。此外，我們也感受到結構本身的不一致與不穩定性，當資深老師勸說順性別男同志的 J「跟學生開會的時候要開門，尤其是

女學生」，不僅下意識帶入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想像，並忽視師生溝通過程中有需要保護學生隱私的可能性。當成員要求學院對 #MeToo 事件有所解釋時，權力結構維護者所給出的答案往往是含糊的，因為當其背後邏輯被清楚點明，當中的荒謬感就會與「理性客觀」相違背，進而讓權力結構失去效力與正當性（亦參見李柏翰、官晨怡、林峻吉、林耕暉、張竹苓，2023）。讀書會的存在正是為了迫使公衛／學院權力文化背後邏輯現身，進而擾動既有秩序。

（四）試探邊界：安全空間、社群與言說的能力

讀書會成員背景多元，初來乍到公衛學院這個機構空間時，尋找一個安全且自在的空間顯得相當重要。有人自身認同為性少數者，不確定這裡是否性朋友善、能夠揭露多少自我；也有人帶性別觀點，卻發現這個領域性別研究鮮少被關注、不被討論，甚或缺乏性別意識，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在各種場合提出性別議題。在找到安全空間或確認是個安全空間之前，成員都懷抱戒慎恐懼的心情在尋找並確認安全的落腳處。確認過程並不輕鬆，例如過去長期待在一個性朋友善環境下的雙性戀者 D 即表示，初來乍到一個新的環境，「毫不順便地尋找可能支持或反對性少數的跡象絕對是要做足的功課」，需要仔細觀察，才能從一些符號（例如「六色彩虹」、「Safe Zone」等標誌）、言談（前人在哪些場合主動揭露自己的性少數身分）、課程內容的設計（是否有性別少數的單元），或教職員的著作、公共書寫或演講等蛛絲馬跡中，一個一個點檢查，確認所在的空間是否安全（D、ww、J）。一方面觀察他人留下的線索，一方面也留下線索讓「同類們」

識別，透過隱微的互動與拋接，慢慢識別出可以共同討論性別議題、揭露自身性／別認同的群體。

除了對性別的關注與友善外，對社群成員來說，如何識別安全空間，權力關係造成的距離是一個重要指標，職級間的權力（資深教授與新進教師、老師與學生），多數與少數的性別間的權力，主流與邊緣的研究議題間的權力。如非臺灣人、非異性戀、順性別女性、自稱女性主義者，在身分政治上有著多重認同焦慮的 ww，察覺到學院中「大家默許的『長幼有序』、『尊師重道』這樣傳統的父權溝通模式」而對師生權力關係感到警戒，「在讀書會的最開始，我的內心很警惕，擔心師生的權力關係阻礙我們的社群運作」（ww）。這樣的警戒，在參與讀書會的過程當中，逐漸消散了：

讓人很意外的是，在不知不覺中，我們似乎做到了？……這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自認為學識還有待精進與探索的學生，才有可能盡量地脫離在其他公衛學術場合中「我不是話太多」、「是不是不夠禮貌」、「我問的問題會不會太笨」的自我審查。（ww）

這樣平等、安全的空間不僅對較無權力的一方有益，對在學院內教書，雖握有權力卻擔心教師身分對異己觀點造成壓迫的 Q 來說，也撐出一個輕鬆討論的地方。公衛學院裡對於不同社會位置的人有不同的社會角色期待，相較下讀書會是公衛學院裡的次群體，不會賦予社群成員僵化的社會角色期待，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在的位置，權力關係對於語言的制約在這裡不復存在（Q、ww、Y）。

我的人生發展與處境，大概與性別分不開吧！確實其他因素也會影響我的人生，但性別絕對是重大影響因子之一。荒謬的是，我卻是直到……進到公衛學院、遇到讀書會的成員，才明瞭自己受性別影響之大、才明白自己真正對抗的是幾千年留下的習慣。(C)

相較於過往提出性別議題時總是被質疑或否定，在讀書會的空間裡，任一位成員在提出想法後，得到的是來自社群開放包容、對多元性別的友善態度，而這正是鞏固安全空間的力量。如過去曾對討論性別議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而常常選擇逃避的 U，發現讀書會是「很包容地鼓勵任何分享與想法」的地方，許多在課堂上遇到想吐槽的性別議題卻幾乎無人可分享的觀點，都能在讀書會暢談，滿溢的情緒得以紓解，也「不再那麼覺得自己的研究主題很冷門或不被公衛界重視」(U)。因此，讀書會內成員首次相對公開地討論近年系所內教師性騷擾多名學生的案件，「讓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個人受苦經驗可以稍微被看見、被討論、甚至被消解，而不是被日常化地視而不見、迴避、否認」(Y)，並進一步討論彼此可以在院內做些什麼，防止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要是沒有性別讀書會這樣的組織力量，單靠個人的人際網絡，很難做到的事情」(Y)。在這般沒有權力關係制約言論的空間裡，原本帶著緊張和擔心前來參與的成員逐漸發現，「制度性的規章條文或許力道最強，但社群的互助卻往往能夠更彈性、更有效即時地接住受到傷害的成員」(D)。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身分、處在不同位置的成員，想法與觀點其實並非如此一致，以下以某次讀書會討論的情境為例，描繪幾位成員如何經歷了一場開放包容的對談、啟發彼此，

形成新的共識，進而連結出屬於讀書會的集體性。如同前述，讀書會的組成過程是有機的，在不同階段自然而然地吸引不同成員加入。隨著讀書會擴大，參與成員越來越多元，其中 AwA 是中後期加入的成員，由於過往的訓練背景，她對於性別議題的認同仍較疏遠。在某次的討論尾聲，AwA 經歷了一番掙扎後，提出疑問：「在公衛學院裡面談性別有那麼重要嗎？」在一場性別讀書會中，這彷彿是「超級政治不正確」的芒刺問題。AwA 小心翼翼地描述自己的困惑，說明她能理解在生活中應注重性別平等，但在公衛領域，政策制訂是為造福多數人，在此前提下仍需要特別考量性別差異嗎？

爾後成員們開始討論，「女人算少數群體嗎？性別是少數人的議題嗎？其實每個人都會受影響吧？」「就算是少數，難道忽略了就能達到所謂的政策最大效益嗎？」這場對話反映每個人對於「性別」在不同層次上的想像與理解，尤其當在公衛領域談及「考慮性別」的研究，有人認為是將研究對象區分男女進行分析、以性少數或「同志」健康為主題的研究；有人認為是將性別放在社會脈絡討論，或關乎性別作為一種結構與系統的研究；也有成員指出，效益主義作為公衛領域背後自證倫理邏輯的危險性。會有如此差異，正因為成員有不同的背景和遭遇，以及性別在公衛學門中發展的零碎與侷限。事實上，AwA 原先很害怕提出這個問題會被「圍剿」，「畢竟讀書會的人都覺得談性別理所當然」，因此她曾先私下與熟識的 C 與 D 討論。C 即使認同性別很重要，但「無法舉出充足的理由說服 AwA，因此也想聽聽大家會如何回答」，鼓勵她勇敢提問；D 來自社會科學的背景，早已習慣視性別為不可不討論的因素，卻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發現自己思考上的盲點，「超感謝你提出這個讓我語塞的問題」。

這次討論雖然最終未能歸結出明確且普遍適用的結論，然而這

個對談過程本身凝聚集體性的關鍵，因為我們從中意識到，原本看似不受歡迎、尖銳的問題，成員的第一反應不是感到被挑戰而不舒服，而是不約而同地選擇先接住此提問，接著才紛紛試圖就自身視角與理解分享想法。我們透過討論、反思，以及不同意見的交流而互相成長（U、AwA、J），彼此都很慶幸這個團體讓新成員願意提出這樣的疑問。正如 ww 所言：

我們以「女性主義無懼打破權力關係」的默契形塑著現在的社群，擁有更多知識權力的人會分享自己在社會性別環境與個人經歷之間產生的感受，真誠且慷慨，也不吝嗇表露自己的不完美。
（ww）

當各種提問找到舒展的空間，我們開始發現「原來不只我這麼糾結」，日常中的想法、情緒甚至是自我懷疑，這過程讓成員們在讀書會中得到共鳴與支持，亦更相信這個社群有寬容的力量接住所有人（A、U、ww、Q）。對於性別意識及性別研究之重要性的共識，凝聚了讀書會的成員，原本分散、感到孤獨的個體，受到彼此的肯認，成為彼此的夥伴、朋友，社群的集體性因此誕生、逐漸茁壯，激勵彼此繼續從事性別研究（A、U）。讀書會成員也透過每一次的討論聚會，更能夠指認出自己過往面對性別議題時強烈情緒的根源，透過表達、回應、彼此確認，可以更具體、更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並且在當中練習如何闡述，當下次「在外面」遭逢他人挑戰或感到困惑時，能夠指認出背後的性別意涵，因此更有勇氣與能力說明、解釋自己的觀點與想法（C、D、AwA），或許就如同 ww 所言：

我在讀書會的過程中體驗到，習慣使用語言將在意的人和議題表達出來，在未來的任何倡議以及行動中都有助益。並且這不但是一个幫助我們明確女性主義訴求的過程，也是一个讓我們對社會既有事實進行質問的過程。(ww)

本篇集體書寫的作者群也因此發現，日常中的提問、抱怨、取暖或有時被詬病之「女性主義者只會講講講」，其實跟讀書會運作的形式相當類似，一樣有大量觀察、反覆詮釋之「講」的實踐；而語言是一種力量，言說更是拾回或掌握力量的重要方法——談論或不談論哪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展現 (Weldon, 2019)。「講」本身就是女性主義一項重要的實踐及知識生產的工具，說破、談論、潑冷水與打擾本身都是重要的行動策略，由許多個人聚集而成的「女性主義掃興人」(feminist killjoy)，就如 Sara Ahmed (2023: 262) 直言，「如果開心是要我們不能直面暴力，那開心就是暴力」。因此，發牢騷本身就是一種抵抗，說出來、寫下來的「當下」就是一種賦權 (C、D、ww)。

(五) 讀書會之於個人與集體：勇氣與付諸行動

讀書會成員分別在不同時間點加入，各自於生活中面對不一樣的性別議題，但共通點是因著對於性別的關懷，成員即使身處傳統公衛學術的結構中，仍從各自的經驗中生出勇氣。加上是有類似關懷的一群人，便無需太懦弱，「要做出比以往多一點點行動的閾值變低了，需要花的力氣變小了」(C)。我們在社群成長的過程中見證組織連結與知識分享的力量，產生更多勇氣和安心感，能去做到單憑個人網

絡很難達成的事情（C、U、ww、Y）。「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力氣保護我珍視的價值，能夠為自己看不過去的事情做些什麼的能力」（D）。然而，在這個群體中，成員也不完全一樣。

我是在讀了大家的書寫才意識到，我對「在公衛學院做性別研究」這件事情上之所以沒有什麼很大的衝擊跟焦慮……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的老師身分，讓我在讀書會裡面可以幾乎不考慮任何事情就繼續「做自己」，但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對我自己在這個場域中權力竟然沒有察覺，覺得是很大的警鐘（wake up call）。但不知為何，我在讀書會裡，好像只有最開始有一點點意識到這件事……但可能後來因為比較熟悉了，我開始忘記其實這個權力差距還是會以不同方式存在……（讀完大家的筆記後）我開始加倍思考怎麼擁抱自己已經累積了一些年歲、頭銜、姿態，它們各自也互相形成了權力，是必須更謹慎去對待的。（Q）

有些成員自承幸運地擁有較多模範與資源，進而期許自己可以勇敢行動，致力撐出空間讓其他人可以勇敢做性別研究。有些成員則受益於這樣的空間，得以開展屬於自己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實踐，這些實踐的場域也不限於讀書會與公衛學院，部分成員們在畢業後，進入到職場時，用在社群中獲得的養分與培養而出的性別敏感度，繼續在性別意識相對薄弱的主流社會中「感受」性別偏見並抵抗著，例如：開始覺察自身經驗與社會事件的性別，希望找到與主流公衛人溝通對話的能力，嘗試在非性別友善的環境中仍堅持做性別研究，勇於對不恰當的玩笑話潑冷水（A、AwA、C、J、Q、U）。有別公衛傳統權威要求精準及追求效益的氛圍，讀書會這個不囿於完美主義的空間，反而使成員得以針對各種性別議題進行開放的交流。

不論是關乎學術研究的，或關乎社會的、生活的討論，讀書會允許我們問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這種新的人際互動模式對我來說是反父權的，就是一種足以帶來改變的集體行動。(ww)

我們也意識到，對行動者而言，更困難的是關於行動的現實面——要怎麼做、做什麼、誰做、何時做。這些細節是身處結構中的行動者持續思考和衡量的重點。Q 發現「真正的挑戰其實是如何讓結構中原本對性別無感的人，看到性別的重要性」；J 則從自己進入公衛學院的矛盾與糾結當中回顧、整理與反思，認為「讀書會給了我一個機會去想這些落差，去測量自己的位置、思考自己想要去的位置，然後校正」。女性主義支撐著我們行動，也提醒我們必須在行動中，持續不斷覺察身處的權力與位置。

我刻意用「做性別」這模糊的詞是為了點出性別影響了我們的待人接物，想表達：一、女性主義的重點是行動；二、性別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到有時候就看不到了，所以更需要行動。例如臺大校園內屢屢出現的性平及其他歧視事件、學院內「性別盲」的基調，以及實際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但另一個掙扎是在一個行動者跟研究者身分之間的拉扯，也擔心著這些不被獎勵的行動，學院內會有人怕我「帶壞」學生。(Q)

經過一連串對話與辨證，從關上門偷偷聊到成為學院中正式的會議議程，當我們真正面對了校園內的 #MeToo 事件，情況也得以和以往有所不同。奠基於讀書會形構的社群力量，我們快速交流想法、彼此支撐情緒，共同討論如何將這些能量轉化成真正的行動計畫。當

深知自己不是一個人，清楚自己是有備援的，讓我們更堅定於付諸行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就從身旁環境做些什麼開始，我們希望防止類似濫權事件再度發生（無論是性騷擾或低薪助理的剝削問題），而不再讓這些事件淪為研究室內茶餘飯後的竊竊私語，甚至迅速被人遺忘（A、C、D、Q、ww、Y）。

四、結論

本文使用集體自傳民族誌的方式，透過女性主義立場論的視角來完成參與式協作之集體書寫，試圖描述公共衛生作為一個學院之學術機構制度、慣習、組織文化及人際關係；作為一個學術領域之規則、邊界、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權力結構與動態，並探索在這個領域中性別研究的邊緣位置，以及一群「邊緣人」在因緣際會發生的讀書會組成過程中形成的社群意識。成員從各自在公衛學院／學界的情感與身體經驗出發，一同書寫並彼此分析，逐漸形成非典型陽剛的女性、非異性戀及陰柔主體協商後的共同立場，並擬訂個人與集體的反抗策略（參見 Chatterjee and Lee, 2023）。

這個讀書會出乎意料地延續至今。對許多成員（尤其本文作者群）而言，這個讀書會成為學院中的支持團體。本集體自傳民族誌之形成，以女性主義立場論為出發點，試圖確認性別的意義、讀書會的意義、性別讀書會在公衛學院的意義，並回顧「我們」如何透過讀書會，進行個人與集體的抵抗，漸進賦予「冷門」的研究主題之正當性。我們透過團體書寫的動態發展與敘事文本之演進，發展出集體的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因此得以超越過往側重個人主義式的立場論書寫，格外有助於探索個人經驗與公衛教育制度之間的關聯性。

本文所描繪之公衛學院內性別意識不足的問題，不只是此學科的文化問題，亦是制度性且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若以決策權分配為指標，可以看到臺灣高等教育普遍有「階級越高，女人越少」的狀況。2020 年數據指出，女性助理教授占整體 40.52%、副教授 36.38%、正教授僅有 23.24% 之管漏效應 (leaky pipeline) (王則閔，2023)。與公衛密切相關的醫界中，女性西醫師僅占 19.7%，牙醫師 28.99%，中醫師 31.27% (于政民，2021)。制度面而言，我們所處的臺大公衛學院尚未出現過女性院長；生理性別與性別意識雖不必然相關，但研究已指出管理階層欠缺特定性別生活經驗，可能導致不利於少數群體的決策 (Ceci and Williams, 2011)。再以公衛學會會員性別比例為例，英美臺日等四國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別不平等，臺灣公衛學會 21 屆理事長僅有 3 位女性，現任 26 位理監事中僅 9 位女性。日本公衛學會 15 屆中從未有過女性理事長，34 位理監事中女性僅占 10 位。美國公衛學會 155 屆以來僅有 27 位女性會長，但現任 24 位理監事中有 13 位女性。英國公衛學院歷史悠久而資料取得不易，但現任 23 位理監事中有 12 位女性。

公衛科學的主流價值為效益主義、崇尚精準和效率，並具有僵固的父權、異性戀常規性，以及家父長式的師生關係，容易使性少數個人、關注性別議題、非典型公衛研究主題，被迫自動隱身。然而，公衛與其他學科的重要差異在於它是一門決定「何謂公平」的專業（如醫療與健康資源分配、預防醫學介入程度），應當具有理解權力結構、指認結構性暴力的能力，以確保社會整體的健康不會以犧牲少數人福祉為代價。然而，處於不同位置的「我們」都觀察到，公衛研究與決策過程常被效益主義把持（儘管不說破），而關照性別複雜性與交織性的批判視角以檢討資源及權力分配規則，易被認為是自找麻煩

或無關痛癢的事。誠然當我們在一個場域中習得資本累積與定義秀異（distinction）的邏輯，在這個場域中逐漸培養特定慣習（habitus）（公共衛生作為知識生產、象徵性的學術領域，抑或公共衛生學院作為有形的、具物質邊界的教育機構）（Olsson, Kalén, and Ponzer, 2019），讀書會成員必須在「拚畢業、升等」與「做自己喜歡的事」之間周旋，在充滿競爭的遊戲規則中建立起有機的社群。

透過讀書會，我們發現串連邊緣經驗是集體抵抗與療癒的有效方法，儘管意識到自身與周遭關注焦點之差異，但因獲得外援而未輕易動搖或改變，社群認同成為性別研究議程的正當化媒介，進一步以「陽奉陰違」、試探及各類行動（如紀錄片放映會）來穩固並試圖擴大社群。「公共衛生」對讀書會成員而言是同時具有抽象與實體層次意義之概念存在，在一個專業養成場域中，「我們」身為行動者，在當中既協商也妥協，而習得適當慣習的人才能開始累積資本，即使對這個過程「感到不適」或反抗，也容易遭遇各種挫折（Bathmaker, 2015; Bourdieu, 1994/Trans. Johnson, Nice, Sapiro, Wacquant, and Farage, 1998）。因此，我們的讀書會筆記中往往能看到每個個人或集體的糾結與能動性，以及各自與場域結構互動的過程，如何尋找及留下安全的符號，以連結並建構成社群，繼而重塑場域的慣習與權力結構——我們透過讀書會結合集體自傳民族誌，形塑「女性主義掃興人」（feminist killjoy）的認同與論述，則是整個過程中最具啟發之看見。

參考文獻

- 于政民（2021），〈醫療職場中的性別隔離：現象、成因與解方？〉，《醫療品質雜誌》，15(2): 68-72。doi: 10.3966/199457952021031502013
- 于政民（2022），《白色巨塔中的那抹彩虹：性少數在醫學知識與醫師養成過程中的歧視》，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則閔（2023），〈我國高等教育女性專任教師概況研究〉，《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4): 99-107。
- 成令方、林宜平、劉盈君（2024），〈健康〉，黃長玲、李佩雯編《臺灣性別100+ 問》，125-138。臺北：巨流。
- 江東亮（2017），〈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的區別：歷史觀點〉，《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6(5): 423-426。doi: 10.6288/TJPH201736106072
- 李柏翰（2018），〈性、健康與情感教育：「以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觀點〉，《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4: 111-120。
- 李柏翰、官晨怡、林峻吉、林耕暉、張竹苓（2023），〈打造加害環境：以臺大公衛 MeToo 事件為例〉，《婦研縱橫》，119: 48-59。doi: 10.6256/FWGS.202310_(119).06
- 金傳春（2009），〈第 16 章：傳染病流行的偵測與防治原理〉，財團法人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修訂四版，中冊），53-94。臺北：健康文化。
- 金傳春、顧家綺（2015），〈第 17 章：傳染病流行的偵測、防治原理與衛生政策〉，王德榮編《公共衛生學》（修訂五版，中冊），57-1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張晉芬（2022），《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梁瓊尹（2005），〈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史耘》，11：117-134。doi: 10.6609/THC.2005.011.117
- 游美惠（2009），〈做性別（doing gender）〉，《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8：98-102。
- 葉明勸、李柏翰（2023），〈效益主義的幽靈：大 COVID 時代的公共衛生倫理反思〉，《應用倫理評論》，74：21-39。
- 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1989），〈第四章：傳染病防治〉，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修訂版），135-208。臺北：巨流。
- 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1997），〈第九章：傳染病防治〉，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修訂二版，上冊），357-438。臺北：巨流。
- 趙秀雄、顧天倫、孫建安（2003），〈第九章：傳染病防治〉，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修訂三版，上冊），357-438。臺北：巨流。
- 鄭雅文（2009），〈第 21 章：社會流行病學〉，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修訂四版，中冊），204-232。臺北：健康文化。
- 鄭雅文（2015），〈第 22 章：社會流行病學〉，王德榮編《公共衛生學》（修訂五版，中冊），227-2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Ahmed, Sara (2021). *Complai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hmed, Sara (2023). *The feminist killjoy handbook*. Dublin: Allen Lane.
-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2006).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core competency development project* (Ver. 2.3). Washington, DC: ASPH.
- Bathmaker, Ann-Marie (2015). Thinking with Bourdieu: Thinking after Bourdieu. Using 'field' to consider in/equalities in the changing field of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5(1): 61-80. doi: 10.1080/0305764X.2014.988683
- Birn, Anne-Emanuelle, Yogan Pillay, and Timothy H. Holtz (Eds.) (2009). *Textbook*

-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chner, Arthur P. (2017). Heart of the matter: A mini-manifesto for auto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0(1): 67-80. doi: 10.1525/irqr.2017.10.1.67
- Bourdieu, Pierre (1994).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Trans. Randal Johnson, Richard Nice, Gisele Sapiro, Loic Wacquant, and Samar Farage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Patrick M., Carol A. C. Flannagan, Matthew P. Reed, Rebecca M. Cunningham, and Jonathan D. Rupp (2014).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age, BMI and gender on severe injury (AIS 3+) in motor-vehicle crashes.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72: 146-160. doi: 10.1016/j.aap.2014.05.024
- Ceci, Stephen J. and Wendy M. Williams (2011). Understanding current causes of women's underrepresentation in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8): 3157-3162. doi: 10.1073/pnas.1014871108
- Chang, Heewon, Faith Wambura Ngunjiri, and Kathy-Ann C. Hernandez (2013).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Chatterjee, Sohini (2023). Neoliberal precarity and neuroqueer possibility: Exploring care, kinship, and relational becoming as resistance. In Sohini Chatterjee and Po-Han Lee (Eds.), *Plural feminisms: Navigating resistance as everyday praxis* (pp. 105-121).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Chatterjee, Sohini and Po-Han Lee (2023). Editorial introduction. In Sohini Chatterjee and Po-Han Lee (Eds.), *Plural feminisms: Navigating resistance*

- as everyday praxis* (pp. 1-9).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Cohen, Julie A., Anusha Kassan, Kaori Wada, and Megan Suehn (2022).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How a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epistemology guided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9(4): 917-948. doi: 10.1080/14780887.2021.1957047
- Collins, Patricia Hill (2009). *Another kind of public education: Race, schools, the media, and democratic possibilities*. Boston: Beacon Press.
- Cornwall, Andrea and Karen Brock (2005). What do buzzwords do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 critical look at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7): 1043-1060. doi: 10.1080/01436590500235603
- Crasnow, Sharon (2009). Is standpoint theory a resource for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 introduction. *Hypatia*, 24(4): 189-192.
- Edwards, Jane (2021). Ethical autoethnography: Is it possib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 doi: 10.1177/1609406921995306
- Ellis, Carolyn and Jerry Rawicki (2013). Collaborative witnessing of survival during the Holocaust: An exemplar of relational autoethnography. *Qualitative Inquiry*, 19(5): 366-380. doi: 10.1177/1077800413479562
- Ellis, Carolyn, Tony E. Adams, and Arthur P. Bochner (2011).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36(4): 273-290.
- Ettorre, Elizabeth (2016). *Autoethnography as feminist method: Sensitising the feminist ‘I’*. London: Taylor & Francis. doi: 10.4324/9781315626819
- Fraser, Nancy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56-80. doi: 10.2307/466240

- Gilbert, Leah and Terry-Ann Selikow (2012). HIV/AIDS and gender. In Ellen Kuhlmann and Ellen Carol Annandale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nder and healthcare* (2nd ed., pp. 209-22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arding, Sandra (2006). Two influential theories of ignorance and philosophy's interests in ignoring them. *Hypatia*, 21(3): 20-36.
- Harding, Sandra (2008). How many epistemologies should guide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 response to Maffie, Mendieta, and Wylie. *Hypatia*, 23(4): 212-219.
- James, Sandy E., Jody L. Herman, Susan Rankin, Mara Keisling, Lisa Mottet, and Ma'ayan Anafi (2016). *The report of the 2015 U.S. transgender surve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 Jhang, JhuCin Rita and Po-Han Lee (2023). Gendering the pandemic: Women's health disparitie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Health Care Analysis*, 32(1): 15-32. doi: 10.1007/s10728-023-00463-x
- Karalis Noel, Tiffany, Aiko Minematsu, and Nikki Bosca (2023).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as a transformative narrative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2. doi: 10.1177/16094069231203944
- Kwon, Chang-kyu (2024). Resistance from the margin: An autoethnographic account of academic ableism.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35(1): 89-107. doi: 10.1002/hrdq.21498
- Lee, Po-Han (2022). Underrepresentation or overexposure: Queer ambivalence to the global healthification of injustice. In Rajendra Baikady, S. M. Sajid, Jaroslaw Przeperski, Varoshini Nadesan, M. Rezaul Islam, and Jianguo Gao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lobal social problem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Living reference work]. *SpringerLink*.

-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8127-2_105-1
- Lee, Po-Han (2023). Un(ac)countable no-bodies: The politics of ignorance in global health policymaking. *Critical Public Health*, 33(1): 48-59. doi: 10.1080/09581596.2022.2025578
- Light, Alysson E., Tessa M. Benson-Greenwald, and Amanda B. Diekmann (2022). Gender representation cues labels of hard and soft sci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8, 104234. doi: 10.1016/j.jesp.2021.104234
- Loehwing, Melanie and Jeff Motter (2009). Publics, counterpublics, and the promise of democracy.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42(3): 220-241.
- Marmot, Michael and Richard Wilkinson (Eds.) (2005).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racken, Kevin and David R. Phillips (2012). *Global health: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New York: Routledge.
- Olsson, Caroline, Susanne Kalén, and Sari Ponzer (2019).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field: Using Bourdieu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preceding medical doctors' specialty choice and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tatus and other forms of symbolic capital on their choices. *Advances in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24: 443-457. doi: 10.1007/s10459-018-09872-3
- Parker, Richard Guy and Marni Sommer (Eds.) (2010).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London: Routledge.
- Pillay, Suntosh R., Joachim M. Ntsetse, and Juan A. Nel (2022). Queering global health: An urgent call for LGBT+ affirmative practices.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10(4): e574-e578. doi: 10.1016/S2214-109X(22)00001-8
- Rouse, Joseph (2009). Standpoint theories reconsidered. *Hypatia*, 24(4): 200-209.

- Rutter, Nikki, Ecem Hasan, Anna Pilson, and Emma Yeo (2023). “It’s the end of the PhD as we know it, and we feel fine... because everything is fucked anyway”: Utilizing feminist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 to navigate global c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2. doi: 10.1177/16094069211019595
- Scott, Susie (2022). Social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5(2): 197-216. doi: 10.1177/1368431020958899
- Skolnik, Richard L. (2008). *Essentials of global health*. Burlington, MA: Jones & Bartlett.
- Skolnik, Richard L. (2012). *Global health 101* (2nd ed.). Burlington, MA: Jones & Bartlett.
- Storer, Norman W. (1967). The hard sciences and the soft: Some sociological observations.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5(1): 75-84.
- Tomaselli, Keyan G., Lauren Dyll-Myklebust, and Sjoerd van Grootheest (2013). Personal/political interventions via autoethnography: Dualisms, knowledge, power, and performativity in research relations. In Stacy Linn Holman Jones, Tony E. Adams, and Carolyn Ellis (Eds.),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 (pp. 576-594).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 Valdez, Natali, Megan Carney, Emily Yates-Doerr, Abril Saldaña-Tejeda, Jessica Hardin, Hanna Garth, Alyshia Galvez, and Maggie Dickinson (2022). Duoethnography as transformative praxis: Conversations about nourishment and coercion in the Covid-era academy. *Feminist Anthropology*, 3(1): 92-105. doi: 10.1002/fea2.12085
- VanLandingham, Mark (2014). On the hard and soft sciences in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9(2): 124-126. doi: 10.1177/003335491412900204

- Viaene, Lieselotte, Catarina Laranjeiro, and Miye Nadya Tom (2023). The walls spoke when no one else would: Autoethnographic notes on sexual-power gatekeeping within avant-garde academia. In Erin Pritchard and Delyth Edwards (Eds.), *Sexual misconduct in academia: Informing an ethics of care in the university* (pp. 208-225).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1003289944-17
- Weldon, S. Laurel (2019). Power, exclusion and empowerment: Feminist innov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72: 127-136. doi: 10.1016/j.wsif.2018.05.014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2009). Accounting for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23(1): 112-122.
- Wężniewska, Paulina, Oskar Szwabowski, Colette Szczepaniak, and Marcin Pławski (2019). The praise of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0(4): 336-349. doi: 10.1177/1532708619863447
- Winslow, Charles-Edward Amory (1920). The untilled fields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 51(1306): 23-33. doi: 10.1126/science.51.1306.23
- Yoder, Janice D. (2018). Challenging the gendered academic hierarchy: The artificial separation of research, teaching, and feminist activism.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2(2): 127-135. doi: 10.1177/0361684318762695
- Zurn, Perry (2021). Feminist curiosity. *Philosophy Compass*, 16(9): e12761. doi: 10.1111/phc3.12761

◎作者簡介（依姓氏筆劃排序）

于政民，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研究興趣為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

李柏翰，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副教授，亦是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理事，近年曾主編《公民不盲從：生而為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麥田，2022）；與 Gizem Guney 及 David Davies 合編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Law: An Analysis of State Failur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Palgrave, 2022)，與 Sohini Chatterjee 合編 *Plural Feminisms: Navigating Resistance as Everyday Praxis* (Bloomsbury, 2023)。

林正揚，目前任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近年協助臺灣疫苗猶豫接種之親職經驗、風險溝通、不良事件敘事等研究。

張竹苓，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現職為 CET 遊學臺灣中心主任，也是北美臺灣研究學會理事，長期擔任臺灣同志諮詢熱線義工。曾任台灣綠黨秘書長。研究和社會運動的關懷以性別平等、同志權益，以及生育權益為主。

廖士婷，一個闖進公衛領域的護理人，碩班才開啟性別議題的敏感度。人生方向轉來轉去，唯一不變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被善待的夢想。

劉曉彤，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畢業生，現任職於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研究興趣為性／別、健康以及 STS。碩士論文為《COVID-

19 中的香港長者與照顧者：以照護的邏輯修繕「疫苗決策」》，專注於探索照顧勞動／決策，政策、醫療科技、媒體之間的錯置或契合。

賴玫均，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謝雨純，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大學部及碩士班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健康不平等、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比較衛生與福利體系。擅長量化研究，包括調查研究、行政資料分析等。

簡瑞琪，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碩士，主要專長為親密伴侶暴力防治，感興趣的領域包含性別研究、健康行為。近期參與之研究計畫關注人工智慧於醫療健康領域的應用。

A Study Group for Feminist Community-Building and Action: A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Jheng-Min Yu,¹ Po-Han Lee,^{2} Jheng-Yang Lin,³
Jhu-Cin Rita Jhang,² Shih-Ting Liao,¹ Hiutung Lau,³
Mei-Chun Lai,¹ Yu-Chun Hsieh,¹ and Jui-Chi Chien^{3**}*

¹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² Global Health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³ Institute of Health Behaviors and Community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as a self-narration process, is useful and suitable for action research in a participatory and collaborative manner. Researchers/actors look fo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tories by thinking about and discussing these storytelling data in depth. The process enables us to explore the collective story's meanings in the narrators' socio-cultural context to construct an actionable plan. Initially, this study group was a series of mission-based events for drafting a shadow report (a critical assessment submit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garding

* To whom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pohanlee@ntu.edu.tw

** All authors have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article, including data collection, discussion, analysis, and writing. The authors' names are listed in order of the number of strokes in their Chinese charact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in Taiwan. Surprisingly, not only has the gathering continued to this day, but its membership, selection of texts, and the scope of discussion have also been expanded.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become a “support group” within the academic setting for many members. Through intensive discussions and triangulation among ourselves, we identify the marginality of “gender”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showing that women’s health is discussed only in the contex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the health concerns of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are egregiously omitted.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women and sexual minorities are conspicuously absent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which, by definition, should attend to the “public”. This study adopts a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s of gender, our study group,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We ponder the reasons for gender to be regarded as irrelevant or unimportant in such an academic field and how we, as a collective, can formulate resistance on both the personal and societal levels and gradually legitimize gender studies in public health.

Keywords: collective autoethnography,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knowledge production, public health, study group, support group